

文学理论读本

Literary Theory:
An Essential Reader

主编 阎嘉

IAS 励学文丛

主编 周宪

文学理论读本

主编 阎嘉

Literary Theory:

An Essential Reader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理论读本/阎嘉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0

(IAS 励学文丛/周宪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12030 - 5

I. ①文… II. ①阎… III. ①文学理论—西方国家—
文集 IV. ①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428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IAS 励学文丛/周宪主编

书 名 文学理论读本

主 编 阎 嘉

责任编辑 陈蕴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652×960 1/16 印张 36.125 字数 485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030 - 5

定 价 6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21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 … 阎 嘉(1)

第一部分 文学理论传统问题的现代进展

- 谁在乎文本……………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17)
- 故事和叙事…………… [美]西摩·查特曼(24)
- 叙事的顺序…………… [法]热拉尔·热奈特(36)
- 适时与晚期…………… [美]爱德华·萨义德(49)
- 风格…………… [法]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 让-吕克·南希(69)
- 三种风格…………… [法]吕斯·伊里加雷(85)

第二部分 文学史与经典批判问题

- 经典与时代…………… [英]弗兰克·克莫德(101)
- 意识形态与经典形式：新批评的经典
…………… [美]约翰·吉洛利(107)
- 历史与虚构…………… [英]劳伦斯·勒纳(154)
- 地理学上的想象…………… [英]戴维·哈维(165)
- 重新占有过去：一种开放性文学史的个案
…………… [英]玛里琳·巴特勒(174)
- 概念创新…………… [澳]尼尔·路西(184)

第三部分 文学理论与批评空间的拓展

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

..... [美] 菲利普·韦格纳(213)

时空压缩与后现代的状况..... [英] 戴维·哈维(230)

生态批评..... [澳] 凯特·里格比(256)

电脑化批评..... [加] 斯泰西·吉利斯(284)

“后”电脑化的“现代”朋克“主义”

..... [美] 布赖恩·麦克黑尔(299)

鬼怪批评..... [英] 戴维·庞特(317)

第四部分 文学理论“终结论”与“后学”

理论之死..... [澳] 尼尔·路西(339)

批评之死..... [澳] 尼尔·路西(367)

无尽的现代性..... [美] 罗伯特·皮平(389)

通往后现代主义之路..... [英] 特里·伊格尔顿(413)

后现代的价值观念..... [英] 凯瑟琳·伯加斯(440)

后现代的理论化..... [加] 琳达·哈琴(455)

第五部分 文学理论与“身份”问题

民族身份与多元文化论的政治..... [美] 亨利·吉鲁(467)

他者问题：陈规与殖民话语..... [美] 霍米·巴巴(486)

流散者批评..... [澳] 苏德西·米什拉(495)

有色妇女与女性主义批评：爱的理论化

..... [美] 塔丝·黑德里希 黛布拉·沃克·金(517)

社会性别与超性别批评..... [英] 萨拉·甘布尔(541)

主要参考文献..... (562)

导论：21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 批评的走向与问题

阎 嘉

一

走向 21 世纪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将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是处于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原因很简单，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把西方文学理论当作重要的参照系和理论资源，而且，从西方引入的各种理论资源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本土的传统之中，成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一部分。无论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这种局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难以改变，甚至还有逐渐强化的趋势。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西化”和“拿来”，而是开创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新局面的动力之一，这早已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

正视这个基本现实，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此，并在深入研究原初文献的基础之上，我把走向 21 世纪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基本格局称为“马赛克主义”。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杂陈，彼此之间看上去似乎没有内在的联系，各自的视角和关注点极为不同，各自在学术圈内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即使就其中的任何一个论域或论题而言，我们也会发现，哪怕他们关注的问题相同，

其立场、出发点、依据的理论资源、论述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也极为不同。换言之，他们对相同问题的看法极为“多元”，绝不追求一致的认同，几乎找不到任何主调。这部《文学理论读本》里收集的论文，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它们的观点和立场足以表明我所称的“马赛克主义”的景况。

我之所以用“马赛克主义”来描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面貌，是想强调：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糅、拼贴的特征，而且都极力表明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力图成为“马赛克”中的一种色彩，既不愿吸纳他者，也不愿被他者吸纳。这种各自为政的“马赛克”局面，正是极力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在外表上，后现代的“马赛克主义”一方面以“多元化”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或操纵的“中心化”；另一方面又以“碎片化”来表明自身不以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为目的，往往只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或者阐发一种观点，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拆解，甚至打破传统学科的边界，在跨学科、跨领域的层面上来探讨某个“专业”问题（例如“性别”问题），结果往往使文学问题溢出自身而渗透到其他领域之中。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文学理论或批评问题了。

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常常有主线可寻，它们常代表着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主潮，成为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标志，例如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那么在现代主义之后，这种状况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很有意思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里，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描述了传统的知识状况和现代或后现代知识状况的这种分野。“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眼里，自柏拉图以降，人类思想就被他们所谓的‘树状模型’（知识之树）所宰制，现在该是终结这一状况的时候了。对他们来说，‘思想不是树状的’；思想是块茎状的……‘许多人在头脑里长着一棵树，’他们写道，‘但大脑本身与其说是一棵树，不如说是

一棵草。’”^①在他们看来，西方传统的思想遵循的是所谓“树状逻辑”，即一元的、因果的、线性的、有结构、有等级、中心式的逻辑；而现代或后现代的“逻辑”则是块茎的、开放的、散漫的，没有结构，没有等级，是一个散漫的“非中心系统”，或者叫后现代的“无结构”的结构：“块茎”有“许多入口、出口和它自身的逃逸路线”。^②他们把这种“块茎”状况称为“非中心的”或“游牧的”思想，这种思维与那种自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的“树状逻辑”思维正好相反，脱离了西方理论理性的束缚，只遵循动力和欲望的非决定性的律令。

说到底，散漫的、“非中心”的“游牧思想”才是要害所在，是后现代时代西方思想的基本面貌，或者说，是他们力图追求的一种境界，以此来表明自己与传统（包括“现代”）的分道扬镳。可以说，在后现代的消费时代里，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确已经告别了前现代和现代的语境与基本格局，脱离了“树状的”和线性的发展脉络，摆脱了总有一种主导的思潮或理论支配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的惯性，而走向一种“马赛克主义”或“非中心的游牧”状态。例如，就新的批评领域而言，有空间批评、鬼怪批评、电脑化（赛博）批评、后电脑化的现代朋克主义、生态批评、唯物批评、道德批评；就关注“身份”问题的文学批评而言，有流散者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有色女性批评、超性别批评和关注“他者”的批评，等等。它们的确呈现出一种“非中心的游牧”状态。

这种趋势的出现，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

首先，它与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基本走向有关。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转变。如果说传统的资本主义主要以大规模的、集中

① 参见尼尔·路西：《概念创新》。

② 同上。

化的、注重功能的社会生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和追求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种满足达到了“相对饱和”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资本主义自身不断发展的活力,就必须在满足基本生存和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寻求新的出路。代表着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目标的,就是战后以大规模、集中化和大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则转向了“灵活生产与积累”,即把跨国资本转向经济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以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作为降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依靠对象。社会生产方式的这种转变,伴随着一系列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变化,即地理上的非中心、分散、空间压缩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与“消费主义”。^① 这一系列变化构成了“马赛克主义”产生的大背景。不过,这种趋势目前还处在发展演变之中,其影响与后果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并且正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向世界不同文化和地区渗透。

其次,它与20世纪以来西方在思想和文化上的主潮有关。这个主潮就是,不断地反抗“传统”和解构“传统”,反抗和解构的主要武器就是极力倡导“多元”“本土”“边缘”“地方”“少数”“他性”,等等。这个方面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不时出现的各种“终结论”或“死亡论”,如对“理论之死”“批评之死”“作者之死”“历史之死”这类话题的极力关注。其实,在这一系列“终结”或“死亡”的话题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们的意图。虽然他们都试图反抗理论、理性主义、总体化、一元论的观念,但他们仍然是从一种理论立场出发去对抗或解构另一种理论,结果并没有完全否定或解构理论和批评。例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巴思曾经撰写过一篇影响颇大的文章《枯竭的文学》,这篇文章引发了西方文学批评界所谓的“批评之死”的话题。^② 可是,当我们仔细阅读巴思的文

① 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参见尼尔·路西:《批评之死》。

章之后便会发现，巴思的真实意图是要挑战“写实主义”（国内通常译为“现实主义”），而他挑战的目的却是要为文学创作开辟另一个“新的空间”，因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挑战传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总体意义上的“文学”，还是特定意义上的“文学”，从而开创一种他心目中“自由的”“开放的”文学。

所以，面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的挑战、反抗、解构和颠覆风潮，应当保持清醒的理论意识，应当追问“终结论”或“死亡论”的鼓吹者们实际上要挑战和反抗的是什么，理论理性和批评理论是否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否真的可以将传统、经典、文学理论和批评本身彻底颠覆或排除。事实上，只要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只是挑战和反抗文学理论与批评传统中的一些陈旧惯例和观念。

二

那么，在“马赛克主义”或“游牧思想”语境中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是否就完全没有一些较为清晰的、相对集中的理论焦点可循？是否完全没有一些较为清晰的、可以把握的发展脉络？就我们的研究而言，答案是否定的。就是说，虽然各种理论、观点、方法各自为政，标新立异，甚至打出各种旗号，但是，20世纪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不时或隐或显地出现在各种理论和批评著作中，有时也有围绕它们的相当激烈的论争。概括地说，我们从五花八门的理论观点中至少可以把握住四条发展演变的脉络或线索。

第一，理性与感性之争。这似乎是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时间虽然推进到了21世纪，但理性与感性之争，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灵与身体之争、超越与现世之争、控制与自由之争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变换着花样一再出现。尽管后现代的文学理论

偏爱并强调感性、身体、现世、自由，但要在理论上说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又会落入理性和理论的“圈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理性和理论的反叛与解构，必须运用理性和理论的武器。这个“悖论”本身就说明了，理论（包括批评）不可能被“解构”掉。例如，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反对把文学和艺术“理论化”，坚持一种“艺术与理论对立”的观点。可是，他用以反对“理论化”的武器，却是18—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其核心是倡导“审美的自由”，实际上这是用“审美”来反对“理论”。^①然而，所谓“审美”，仍然需要用“理论”来加以界定和说明；一旦用“理论”来界定和说明，“审美”就又落入了“理论”的圈套。

的确，西方的文学和艺术理论自20世纪以来，就不断存在着反理性和反理论的强大思潮。这个事实使我们想到，“理论”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要对文学创作的实践进行反思和概括（即所谓的“理论化”），而一旦做出了某种概括，似乎又对创作实际形成了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约束”，对艺术家的个性形成某种“威胁”。这个悖论可能是我们永远都难以摆脱的。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悖论，即“执着地”纠缠于理性与感性的矛盾，或者总是自以为是地以为理性高于感性，那么就绝不可能走出这个怪圈。唯一的出路或许是：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要去“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其实，我们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各种“挑战”中看到的，正是对于“理论”以“牧师”的身份试图给“信徒们”教训的姿态的反叛。如果说国内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界要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吸取教训的话，恐怕这就是最大的教训。

^① 参见尼尔·路西：《理论之死》。

在理性的问题上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我们通常没有仔细区分“理性”的不同含义。比如，作为推理和推理的依据意义上的“理性”，与作为形而上之预设意义上的“理性”，二者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意味着从经验和事实出发进行推理，注重的是因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意义上的“理性”近似于“工具理性”，经常与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起；后者从先验的预设出发来判断事实是否“合理”，注重的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契合、观念与现象（事实）的契合，经常与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这两种“理性”之间的关系既可能相互对立，或者以其中一个来反对另一个，也有可能相互交织在一起。如果对此不加以细察，就很有可能误解有些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使用术语和进行论述时的一些立场上的差异。

第二，科学与人文之争。科学主义是西方思想自19世纪以来最为强大的思潮，我们对它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表现并不陌生。20世纪西方思想界著名的“语言学转向”，实质上是科学主义入侵人文学科的典型案例。此后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包括“新批评”）文学理论，进一步巩固了科学主义在人文学科中的地盘，传统的以“人”“意义”和形而上为依归的文学追求（包括浪漫主义），退缩到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地位上。在21世纪新的语境中，科学主义继续在扩大“战果”，不仅把各种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出来的方法推进到了十分精细的地步（如各种文本分析的方法），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一些新的批评领域的出现，例如电脑化批评和电脑“朋克主义”，人和机器、人的语言和电脑编程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以新的方式折射出当代科学与人文之争的新图景。^①

当代西方思想中，科学与人文之争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在20世纪经过分析哲

① 参见斯泰西·吉利斯《电脑化批评》，布赖恩·麦克黑尔《“后”电脑化的“现代”朋克“主义”》。

学的强化,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①因此,今日的科学与人文学之争论,时常体现为“事实”与“价值”之争论,即争论“事实”与“价值”哪个更重要。从总的情况来看,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更加注重“事实”“推理”“形式”“结构”“文本”“语境”的精密分析,有时甚至到了烦琐的地步,排斥意识形态的介入和价值判断,强调立场的“中立”和“中性”。^②另一方面,科学主义的强势对人本主义传统中的一些重大主题进行挑战和颠覆,如质疑“主体性”“总体化”“同质性”“元叙事”“真理”,等等。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方面的论争不仅旷日持久,而且不时呈现出激烈之势,现在很难看出孰胜孰败,这种论争很可能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当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也并非没有可能,但二者能否达到深度融合,却值得怀疑。

第三,线性发展观与非线性发展观之争。大致而言,20世纪以前西方思想中的发展观是线性的、注重因果逻辑关系的和进化的。这种发展观的核心在于追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进入现代和后现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连续的、一致的、线性的发展观让位于断裂的、不连续的、非中心的、无逻辑的发展观。德勒兹的“游牧”或“块茎”思想与传统的“树状逻辑”的分野,典型地代表了后现代在这个问题上的取向。正如他在《千高原》里所说的:“树是分叉的,而块茎是缠绕的,而且只是缠绕。树就像动词‘生存’,而块茎的构造则是连词‘和……和……和……’。这个连词具有足够的力量摇撼和颠覆动词‘生存’。你将去何处?你从何处来?你为何要前行?这些都是一些完全无用的问题。改过自新,从零开始或起步,寻找一个起点或基点——所有这些都隐含着航行和运动的错误概念……抛弃本体论,处理基础论,使结尾和开头无效。”^③

① 本书中凯瑟琳·伯加斯的《后现代的价值观念》一文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② 例如,本书中约翰·吉洛利的《意识形态与经典形式》一文以美国文学理论界的“新批评”为例,对这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

③ 引自尼尔·路西:《概念创新》。

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对德勒兹的这种观点大加赞赏,认为德勒兹凸显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真理”,并且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西方知识传统的一切概念和范畴所进行的最为持久的后现代攻击”——“以各种形态或形式彻底辩证地反对‘启蒙’理性。”^①诺里斯的这个说法,的确道出了在历史、传统、思想发展问题上的尖锐冲突。不过,我们不应把这样一种看法或姿态看成不负责任的愤激之辞。传统的线性发展观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中确实造成了很多值得认真批判的后果,如机械论、决定论、教条主义、简单化的痼疾,使一些新锐的理论家对传统的线性发展观深恶痛绝。但在另一方面,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是否就是断裂的和散漫的,或者说是否毫无线索可循,也是大有疑问的。

第四,解构与建构的问题。所谓“解构”,已经成了后现代的典型特征。解构主义者所针对的目标是所谓“元叙事”或“元话语”,它们多半是以传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出发点或理论诉求的“理论预设”,如审美自由和解放、道德上善与恶的评判、意识形态的功利目的,等等。解构几乎已经成了一个时髦而且具有“穿透力”的词语。其实,所谓解构,换成老套的说法大致可以说成批判的反思。如果真的是严肃认真的批判的反思,倒是必需的;然而,我们时常可以发现,“解构”成了一些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策略,即借“解构”之名来张扬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即便按照利奥塔等人的观点将一切“元话语”都解构掉了,那么,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们凭借什么去反思和批判文学理论的问题?

客观地说,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如果没有对既有理论的反思性批判和解构,就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后现代理论在解构既有理论的同时,实际上又张扬了自己的观点或理论。例如,当我们认真阅读那些解构“大师”(从尼采到福柯、利奥塔)的

① 引自尼尔·路西:《概念创新》。

著作时，实际上可以发现一个确凿的事实：他们在对既有理论和观点进行解构时，同时也在建构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家经常爱用“戏仿”这个词语，即既与研究对象融合，又挑战研究对象。^①这是一个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悖论性的词语，实际上表明了后现代理论家们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因此，当我们面对后现代质疑主体性、合法性、同质性、中心化、连续性、元叙事、真理、永恒等范畴时，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他们表面上的姿态迷惑，而应该对理论问题进行细致认真的分析。

三

我们知道，自20世纪的现代主义以来，“反传统”始终都是各种创新理论和各种先锋主义在理论上摆出的一种姿态，并且也是它们最为重要的武器之一。然而，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中，虽然有关“传统”的论争相当复杂，但它依然是“马赛克主义”语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传统”始终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重要问题，有时甚至是各种创新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其中的道理在于：一方面，“传统”始终是我们进行新的理论建构和在理论上进行反叛必须依靠的资源，甚至是主要的资源；另一方面，即使真正的意图是要反对“传统”，但在实际上，“传统”很难被“反”掉，正如解构既有理论要借助理论的武器一样，反“传统”往往也要借助于传统。

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对“传统”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上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的重新评价上，即所谓的“价值重估”。当然，“价值重估”并非始于今日。上个世纪

① 参见琳达·哈琴：《后现代的理论化》。

初，尼采就曾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震惊了学界，此后，“价值重估”几乎成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惯性”或风气。例如，弗兰克·克莫德的《经典与时代》、约翰·吉洛利的《意识形态与经典形式：新批评的经典》等文章^①通过追问“谁的经典”这个根本性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经典与权力的关系，经典与权威的关系，经典与阐释的关系，经典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经典与宗教、传统、真理、大众的关系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在这样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论争的焦点所在，而且也可以发现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自身的特性。例如，当今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相当一部分最初是从教会的神职人员中分离出来的，而后进入了大学等“体制”之中。他们在信仰、观念、学术训练等方面所秉承的“传统”，与“世俗”的“传统”大为不同；在另一方面，在这种传统之内争论“经典”问题，也就常常与宗教之中的“正统”和“异端”联系在一起，与“人数”上的多数和少数联系在一起，也与他们所关注的“大传统”和“小传统”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特有的传统和资源，的确是我们所没有的，也是我们常常无法理解并发生误解的地方，而我们在关注西方时，大概很少注意到这样的差异。

在后现代时代，西方文学理论关注“经典”问题，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权力问题的关注。例如，弗兰克·克莫德的《经典与时代》一文明确认为，“经典”始终要与权力合谋，要为主流意识形态塑造“过去”，并将“过去”变为“现代”。因此，就权力斗争而言，“经典”往往成为“反叛者”为了争得权力必须占领的主要领域。如果这样来看问题，有关“经典”的论争实际上就成了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争夺权力的斗争的延伸。当然，那些理论家和批评家很明白，这种“权力”是所谓“话语权力”，而不是别的什么权力。即便如此，有关“话语权力”的讨论，在后现代时代绝非一

① 这两篇文章均收入本书，可参看。

个“冷门”话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只关注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文学的“内部研究”，其实，他们也许比我们还要关注似乎不那么时髦的“外部问题”，他们对“身份”问题过于热衷的关注（如种族、民族、公民权、性别、他者等不同的“身份”），就是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其他的热门话题包括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公正问题、民主问题，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当今的东西方差异之一隅。

我以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极为关注“传统”的问题（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却不然），而且他们始终都带着某种“使命感”来争论这样的问题，因此，常常把我们以为已经“过时”的一些问题（如政治和意识形态）带入到学术讨论中去。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例如，英国学者在讨论英国文学时，极力强调“英语文学”与“英国文学”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的英语以及“英语文学”的鄙夷，以至于竟然说受人推崇的“英语文学”是以“一流语言”表现了“三流文学”。^①我们从中完全可以看出老牌帝国主义的傲慢；而我在这里要关注的却是，他们在谈文学问题时，常常带着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这也告诉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典范”。

在对“传统”问题的关注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在追溯和争论许多重大问题时，总会将之追溯到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例如，谈“风格”，谈“叙事”，谈“文本”，谈“经典”，谈“文学史”，谈批评方法，谈“主体性”，谈“理论之死”，谈“身份”，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等，几乎都离不开浪漫主义。或者说，当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问题似乎都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

① 参见玛里琳·巴特勒：《重新占有过去》。